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看澜集



Thirty Years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葛兆光◎著



Thirty Years

看瀾集

葛兆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澜集/葛兆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8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6622-7

I. 看… II. 葛…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7339号

看澜集

葛兆光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21 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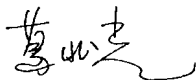
ISBN 978-7-309-06622-7/C·127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说来惭愧，当受邀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词，居然是“囊中羞涩”。之所以如此，事后想想，大概有些原因。首先，我这三十年虽然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却从来不算是时代弄潮儿，只有总在潮流中的人，才可能在文字中呈现这三十年的中国风景，而自己从事的是古代历史、宗教和思想领域的研究，那毕竟只是一个远离波涛的领域。特别是，在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1978年到1984年间，在大量故纸堆和新论著的包围下，基本没有写过“轻松”或“激扬”的文字。尽管我可能是“文革”后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学生，但那些都是枯燥和沉重的学术论文，并不能见证这三十年，特别是改革开始那些年的历史，似乎不宜收在这里，只是找到一些当年的读书札记，既证明大学走出“文革”后的学习风气，也表示那几年自己并未虚度。这些文字既不能带来阅读的“愉悦”，又不能呈现时代变幻的“风云”，显然不符合编这套书的原意，这是我要事先道歉的。此外，是因为自己从来不敝帚自珍，对文字也总是不那么修饰，习惯上往往是写好了就拿出去，在朋友的催促下又常常会编一些随笔的集子，算起来这些年写的各类随笔也已经编了六七个集子。我的习惯是，不愿意把自家那点儿东西反复重编，浪费读者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在不得不编的情况下，就只能尽量挑选一些较少收录于各种集子的文字，可是，苦于没有多少“存货”，想来想去，只好尽量多翻检一些大概没有编集的文章和没有发表过的札记之类“充数”。这样一来，使得现在选出来的文章，根本算不得什么“代表作”，充其量只能是我这三十年文字生涯的一个侧面罢了，这有点儿对不起出版社，更对不起读者，好在这些文字中间，也许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并不那么轻松、多少有些学究的人的半生光景。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编这个集子，这让我重新审视了一次我的三十

年。对一个人来说,三十年是很长的时间,而对于接近“还历”之岁的我来说,三十年刚好是以往人生的一半,让我编这本集子,使我不得不进入自我的回忆,看着这些文字,仿佛在检视自己三十年的学术之路,不免有很多感慨,在这里,不说也罢。

2009年2月写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七八

开学琐记——回忆 1978 年的春天 / 1

一九七九

读《论语》、《孟子》札记三则 / 4

一九八〇

读《史记》札记三则 / 8

一九八一

胡仔考 / 12

一九八二

《旧唐书》与《新唐书》 / 17

一九八三

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 / 24

一九八四

唐集琐记 / 28

一九八五

道教与唐诗 / 38

一九八六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禅宗 / 55

一九八七

《道教与中国文化》序 / 66

一九八八

宋代文学导论 / 74

一九八九

从《觉后禅》说起 / 83

一九九〇

劫·连环劫·生死劫——新武侠小说讲故事的诀窍 / 89

一九九一

说“无”谈“空” / 94

一九九二

吾侪所学关天意 / 103

一九九三

过去的故事 / 112

一九九四

运化细推知有味——关于 30 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随想 / 115

一九九五

世家考 / 124

一九九六

看东洋景儿(四则) / 131

一九九七

学术的薪火相传 / 140

一九九八

《走近清华》序 / 151

一九九九

缺席的中国 / 159

二〇〇〇

石为云根——文献中所见的奇石观赏史 / 166

二〇〇一

历史的意义——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 / 175

二〇〇二

泉屋博古馆和藤井有邻馆——重访京都日记两则 / 185

二〇〇三

以“国家”的名义 / 189

二〇〇四

书林穿行断简 / 193

二〇〇五

大明衣冠何处? / 198

二〇〇六

思想史与每个人相关 / 207

二〇〇七

最后的贵族——孔子的时代和他的理想 / 216

二〇〇八

通过亚洲认识中国 / 224

附录：学术简表(1978—2008) / 230

一九七八

开学琐记——回忆 1978 年的春天

I

那一年开学,不是在通常的 9 月,却是在 3 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第一次发榜,第一次上学,一切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的事,可以不按牌理出牌。

收到入学通知书时,刚刚过元宵节,贵州冬天的尾巴很冷,春天的暖意却还没到。说是过节,但那个时候既没有过节的心情也没有过节的气象,正月十五又不观灯,也没有元宵吃,何况是远在苗疆的小县城,傍晚只有几处昏黄的灯光闪烁,街上显得冷冷清清。在单位里看到印了北京大学红色字样的信封,知道有好消息,便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开来看,现在记得的只是,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然失态狂笑,但我在这笑声中体会到的,是她心里积压多年的辛酸。

没有办法不辛酸,母亲是多年的中学教师,在天津教过有名的十六中,在北京五十五中带过吴运铎班,当过全国群英会代表,荣幸地和毛主席合过影,随父亲下放到贵州的县城里,在一个很差的中学任教,还是兢兢业业,可是自己的儿子,却因为父母的缘故,十年里,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差一点儿被发配到偏远山里小煤窑里守小卖部,怎么能不辛酸?

可一纸录取通知书改变了命运。

II

行李很简单。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有的大学生,开学报到的时候,

陪同人员浩浩荡荡,随身的行李车水马龙,那劲头儿,只欠了差遣仆人,举个“回避”、“肃静”牌喝道。那时的我们,最多衣服两三套,加上茶缸一只碗一个,揣上一叠子粮票和被父母捏得发热的几张钱,就上了路。不过,我带了一些想象中将来四年中有用的书,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也带上了我平时抄书留下的几个大笔记本。带上那些书,是因为录取我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古典文献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只是知道要读古书,所以,这些“文革”焚书余烬里残留的书也许用得上。至于带上那几个大本子,是因为舍不得好些年心血和记忆,在这些本子里,我抄过很多当年出版的内部书,现在还记得的有三类:一是各国历史,像《圣马力诺史》、《匈牙利史》之类的书有好几十本;二是苏联解冻后的小说,像《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之类,这是当年最爱看的东西;三是翻译的各种政治性读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类拔萃之辈》。在这之外,笔记本里还抄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当然,也抄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甚至还有当年上海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中关于“宇宙红移现象”、“板块漂移说”的文章。

这些东西统统装在从知青时代就做的一口大樟木箱里,贴上录取通知书里附带的“北京大学新生行李托运单”,从凯里火车站运往北京。这些东西后来伴随我很多年,至今有些破烂的老书和笔记本还在我的书柜下,只是那口大樟木箱,在多年辗转的搬家中,终于不知踪影。

III

火车轰轰隆隆地开了两天两夜,把我从苗疆运到京城,一路颠簸辛苦,都不必说了,现在还记得的是当时坐车太多的昏昏沉沉,记不得的是校车怎么就七转八绕到了北京大学,住进了三十二楼,据说,大凡车经天安门,例行有一阵欢呼和骚动,可我事后回忆,却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那一年不知道是否举办过开学典礼,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飞沙扬尘的五四操场

和“文革”时代残余下来的政治气氛。有斗争聂元梓大会的情景,在东操场第一次看到这个曾经因为第一张大字报而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当时上台的人批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并不很英武威严,竟然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也有修缮五四操场时看到梁效们的记忆,当时看到的人中,有很多后来成了我们老师的大牌教授,只是那时的他们,穿了厚厚的棉衣棉裤,动作艰难得沉重,而且面容沮丧得窝囊。北京春天的风沙很大,在漫天黄沙石乱走之中,总觉得他们在瑟瑟发抖。

进学校的时候,住宿和吃饭就已安排好。宿舍很拥挤,六个人一个屋,分上下铺,本来应当是八个人一个屋的,因为对面是厕所和水房,便稍稍宽松些。去得晚了,只能在上铺,不得不忍受下铺同学喷云吐雾时的烟熏火燎。食堂却让人惊喜,从贵州山旮角来,陡然发现,这里竟然有肉吃,不免喜出望外,尽管陈年的玉米面粥味道不佳,所谓“苏造肉”也掺了太多的淀粉(请教了很多同学,至今我仍然不知道“苏造肉”这个名称从何而来)。

有住有吃,便要读书了,当修缮五四操场的劳役结束,我们便开始正式上课,这时,大概已经是3月中旬了,只是3月的北京,风仍然很大,树上也还是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绿意。

* 本文是在编选这本文集时补写的,并不是1978年的旧作。

一九七九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上大学后开始读《论语》、《孟子》时写的札记，现在还记得我用的是当知青时就拥有的一本石印本《白文十三经》，那个时候知识少，也不怎么看前人的考证和注释，因为不知天高地厚，就总觉得处处都有独家心得，可以发前人之未发，于是写下了不少这类札记。现在看来，这些札记有些浅，也有些错，不过，如果不用“后见之明”厚非当年的话，倒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好不容易上了学的人，是怎样读书和起步的。

读《论语》、《孟子》札记三则

一、《论语》、《孟子》引《书》与“书百篇”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亦称：“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这是孔子整理《尚书》百篇之说，但后世学者，尤其今文家多不信，以为五经虽经秦火，然而依旧大体全貌，恐《尚书》原本并无百篇。一时聚讼纷纷，因时久史阙，也无从详考。

但读《论语》、《孟子》，似乎让人颇信“书百篇”的说法。

《论语》对于五经，引用最多是《诗》，其次是《尚书》。其中，明白地说到《书》的地方有二：一是《为政》中载“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是孔子引用来教导弟子的；二是《宪问》中的“子张曰：《书》云：‘高宗谅

阴,三年不言’,何谓也?”这是弟子引用来请教孔子的。此外,引用《尚书》但未明言的,则如《泰伯》中“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尧曰》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文《墨子·兼爱》和《吕氏春秋·季秋纪》引为汤克夏后之祈雨辞)。可能这些文辞都是古《尚书》中的话,在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之外。

《孟子题辞》说,“孟子通百经,尤长《诗》、《书》”,司马迁在《史记·荀孟列传》中又说孟子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孔子之意”。则孟子对《尚书》也很精通,《孟子》中,明确引用《尚书》的地方有十七处。如《梁惠王上》“《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梁惠王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又,“《书》曰:‘奚我后,后来其苏’”;又,“《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公孙丑上》“《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滕文公上》“《书》曰‘苦药不瞑眩,其病不瘳’”等。此外,另有《尽心下》中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于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一段,可见“血流飘杵”是《武成》篇中语;《尽心上》中的“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大甲贤,又反之,民大悦’”,伪古文《尚书》虽采用为《太甲》篇,但今按,可能是《伊尹》篇中语;《万章上》还有“舜往于田,号泣于昊天……”和“父母使舜完廩”等,语颇古奥,与所引《书》中的“祗载见瞽瞍”亦复相近,如果真是《尚书》中语,那么,《孟子》引《书》凡二十条,除去重复的三条尚有十七条,可是除了见于今《尚书》之《尧典》、《汤誓》、《洛诰》的各一条外,其余的都是今文《尚书》所不见的逸文遗篇。

《论语》、《孟子》合引《书》凡二十一,而逸篇占十八,由此可见,春秋末至战国中人尚得见较多篇《尚书》,而所谓“《书》百篇”之说,应当大体可信,所谓“百篇”只是言其多而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原二句中有“有马者借人乘之”,但《汉书·艺文志》所引无,故宋叶石林以为衍文而删去之),则原《尚书》恐不止百篇,孔子所见已是“阙文”,尚有百篇,则今人视《书》百篇之存者,就好比孔子所见《书》残存之百篇,都已经是“阙文”了。

二、《史记》列传以伯夷为首乃本《论语》之旨

《史记》以伯夷为七十列传之首，后人颇有讥弹者或曲解者，然均以为非圣人之意。如宋人《涉史随笔》便说“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其善而无报也”；张耒《司马迁论》更说，这是司马迁自比伯夷、叔齐的结果。但是这些揣测，恐怕都不吻合司马迁的想法，如果细读《论语》，可知司马迁尊崇伯夷，也许正是根据孔子的观念。

《论语》说到伯夷、叔齐的地方有四处：一是《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二是《述而》中答冉有问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三是《季氏》中所谓“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四是《微子》中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推崇可谓备至。

孟子说，伯夷叔齐为“仁之清者也”，孔子集“仁”之大成，内有三焉，其一便是伯夷、叔齐，所以《史记》列于七十列传之首，正是尊奉《论语》中的说法。

三、孔子与避世隐遁之风习

避世全身，隐居韬晦，这一风气汉晋之后大盛，隐居之事虽学者多说受老庄影响，然其中多有儒者，考诸史书可知。朱熹称赞“真个不要官”的陶渊明，早年亦“游好在五经”的儒士，只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所以便想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按，研究儒家的学者多认为，儒家思想以入世、进取、汲汲于政治、斤斤于仕进为特色，但不知孔子时代之儒者，已经有隐居遁世的想法。

细读《论语》，可知孔子思想中已有无奈避世的一面，《宪问》中的“贤者避世”，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在《公冶长》中，他赞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深深感慨于“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便是大智若愚的“愚”，也是佯狂避祸的高明手段。据说，孔子尤其激赏南容“邦无道，免于刑罚”的处世态度，据说因此还以兄长的女儿嫁给他。而在《先进》篇中，孔子与门人论志

向,他不以子路的治国、冉求的富民、公西华的赞礼为意,而盛赞曾皙“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人们熟知的经典语录,而在《微子》中,他听到长沮、桀溺之言而感慨有出世之志的记载,虽然不尽可信是孔子原意,但从《公冶长》“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一语中可以看到,那种无奈而退隐的想法,圣人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相辅相成,在孔子与儒家思想中两面皆本有,不必远取自老庄。儒者对于世事,究竟是入还是出,全以“邦有道”与“邦无道”为关键。后世儒者洞练世情,渐失其本色,《荀子·臣道》所谓“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春秋繁露·楚庄王》“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虽本之《论语·宪问》中“邦无道,危行言孙”的自我保全之旨,但却渐失《论语·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洁身自好之意。

一九八〇

1980年，我一面读《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提要辩证》，翻遍了北大图书馆几乎所有带提要的旧书目，一面开始读《史记》，结合着读《太史公行年考》、读《司马迁年谱》，接着又往下读《汉书》、《后汉书》，一直到《晋书》等，渐渐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培养了兴趣，这使得我不仅本科和硕士论文都和史学有关，而且在当时的刊物上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下面这几则札记，就是在读《史记》的时候写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却意兴阑珊，也没有把它们铺衍成文。

读《史记》札记三则

一、太史公“厄困鄱、薛、彭城”说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研究者于此数语曾反复推究，或考其行程，或计其路途，或探其年代，但对于其中“厄困鄱、薛、彭城”一语，却留意不多。

案：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史记解题及读法》、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等，皆根据《正义》所说，定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而桑原鹭藏、郭沫若、李长之、王达津诸家，则据《索隐》反驳，认为太史公应当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两说不同，聚讼纷纷，迄今未有定论，如果细考“厄困鄱、薛、彭城”一语，恐怕应当以前一说是。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条说，太史公“此游所涉历甚多，阅时必甚久，约计当有数年，归后仕为郎中”。此说甚确，然“厄困鄱、薛、彭城”究竟在哪

一年呢？案：首先需要说明，“厄困”一语，绝不是司马迁对于孔子困于陈蔡一事的东施效颦，应当是实有所指，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记淮南王“反，自杀”，此事《淮南衡山王列传》记载甚详，这是汉武帝时代之一大动乱，淮南王治地在今安徽南部，正当“鄱、薛、彭城”（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往梁、楚即南方、西方要冲，故史迁滞留颇久，直至“（淮南）国除为九江郡”后，才能“过梁、楚以归”，故颇疑“厄困鄱、薛、彭城”一事，当在汉武帝元狩元年，为司马迁出行第四年，按照《正义》推算，当时司马迁二十四岁，与“二十岁而南游”较合。如果按照《索隐》的生年推算，司马迁出行的时候，正是“天下晏然”的太平时候，怎么会“厄困鄱、薛、彭城”？这倒恰恰可以为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的说法作一个旁证。

王达津力主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其论证说，若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则其出游的二十岁时，正是元朔四年（前125），当时淮南王谋反之意已具，司马迁不应当选择乱时出游，他又说，纵然司马迁要出游，必定对淮南王事有一定见闻，然而《史记》“却表现了在淮南王死后才到了江淮访问的语气”，所以，司马迁出行一定不是在元朔三、四年。他还根据这一判断，认为司马迁应当生于建元六年（前135）而不是更早十年的景帝中五年（前145）。但是，王氏没有对“厄困鄱、薛、彭城”一事进行详细考证，因此没有能够判断，司马迁之游历淮南故地，正好是在元狩元年（前122）国除王死、南道初通之后，可不正是“淮南王死后”的事情？又，古代资讯未必如今日之迅捷，元朔四年之际，淮南王虽然谋反已具端倪，但那是政治机密，太史未必能够知道，更何况年轻时的司马迁“少负不羁之才”，又怎么会在依稀风声中害怕出行呢？

二、“至于麟止”疑为司马谈纪事之下限

《太史公自序》既说“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论”，两说前后不一，以至于后人颇有疑惑。

案：司马迁纪事，应当讫于“太初”（前104—前101），读《史记》各篇可以证明，